

经济活动的 分析与评价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资料专辑

一九八七年四月·北京

经济活动的分析与评价

编 审：马 阳

一九八七年四月

参加选编人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 阳 王 毅 王恩同 朱桂英

刘戈平 孙风琴 毕静莲 李惠娟

邢 鲁 孟建华 汪 泓 邱淑敏

封斯蓉 崔莉娜 章蕴芬 曹曼株

责任编辑：刘戈平 王恩同

责任校对：李燕杰 唐北晓

封面设计：李燕杰

经济活动的分析与评价

目 录

经济发展(节选).....	栗庆雄(1)
管理.....	格伦·波特(13)
论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测算.....	张惠良编译(22)
技术预测的若干重要概念.....	乔斯夫·P·马尔提诺(30)
日本的指标预测.....	森一夫(43)
社会技术系统与社会技术设计原理.....	A·彻恩斯(50)
软件与表格文件的价值分析.....	托马斯·金(56)
用于比较方案的三种收益率方法.....	J·R·卡纳达等(69)
社会生产效果的理论问题.....	B·C·瓦因什坦(84)
生产规模效果的评价.....	A·M·萨索夫(92)
工业规模效益的标志和原因.....	M·赫尔斯基等(94)
怎样进行费用—效益分析.....	P·G·萨松等(106)
费用—效益分析中的次最好问题.....	E·J·米沙恩(115)
投资行为研究.....	金子敬生(121)
美国铁路电气化的能源考虑.....	小哈尔·比·切·库珀等(131)
毛线价格预测因子分析法.....	砂田吉一(142)
美国和其它国家跨国公司国外投资预算方法的调查.....	萨克·H·吉姆等(154)

经 济 发 展 (节选)

〔美〕 栗庆雄

一、太平洋盆地地区与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 导 言

在太平洋地区中，第一个跻身于经济发展的国家是日本，在一九六三年，日本的人均所得超过意大利时，正式被列入已发展国家。当时似乎并不轰动一时，因为日本在战前已有雄厚之工业基础，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必须以日本为其跳脚石，是以对日本予以无数之资助，使其重工业不但能重整，还可趁机淘旧换新，使用最新、最高效率的设备。再加以美军驻防，日本本国军费支出等于零，资本得以快速积累。

到七十年代发生两次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与日本之经济都大受打击，一蹶不振。仅是亚洲四龙——南朝鲜、台湾、香港及新加坡——虽因不产石油，也受害匪浅，但尚能维持阵脚，对此外来的冲击也可设法弥化，维持高增长、低失业与较平稳的物价。因此被世界誉为新兴工业地区。使一般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也由欧洲之悲观经济转到了亚洲的乐观经济，大家纷纷研究“亚洲四龙”是采用什么经济策略能维持如此高变的增长？依照最新之预测，这些地区在二〇〇〇年左右都会成为已开发地区。

在此四区中，两个没有农业，也没有腹地，另两个地区虽有腹地，但天然资源相当贫瘠，国内市场也都非常狭隘，唯一丰富的是劳动资源，更由于地理位置之便利，所以都是以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发展之原动力，而他们的贸易对象都是以美日两国为主。当然香港因其地缘关系与中国大陆本埠之贸易量也相当庞大。

中国在一九七六年动乱停止以后，大家的注意力也转到经济方面来，如何现代化，如何改革，有何困扰，也成了一般人谈论的目标。总的来说，两个最大的论点是：第一，中国是太平洋盆地中一个主要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可否采用这些地区的经验？第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如南斯拉夫、匈牙利等的经济发展过程，是否值得参考。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这里让我们先谈一谈太平洋盆地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吧。

(二)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

因为太平洋盆地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以对外贸易为其主动力；因此，我们先研究外贸如何能帮助经济增长。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对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作一简单的复习。

1、两国间商品之贸易——比较利益论

在讨论两国间的贸易，为方便分析起见，我们先作下列的三个假设：

- ①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完全不能移动；而在一国之内，则可完全移动。
- ②商品及劳务的国际间贸易，没有运输成本及其它人为障碍。
- ③国际价格之比(也称为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与国内价格之比有所不同。

假设甲国是一封闭国，拥有固定量的生产要素资本(k)与劳工(L)，可以生产食物(F)与汽车(C)。这些生产要素及产品的价格是： P_k ， P_L ， P_F 与 P_C 。如果甲国按当前的生产技术，将所有生产要素全部投注在生产食物上，可生产 F_0 量的食物；如将所有生产要素来生产汽车，可生产 C_0 量的汽车。经过 F_0C_0 两点，可作一条向原点正曲的生产可能曲线。(图1)这条曲线上每一点是代表以现有的技术，可能生产食物与汽车的总量组合，这条曲线就是生产可能曲线，其斜率就是两种商品之生产边际转换率。这条曲线向原点正曲，是因边际产量递减律，或机会成本递增律的作用。

如果甲国消费者对食物与汽车的偏好可用一组向原点反曲的、互相平行的无差曲线表示之；在同一条曲线上之各点表示人们的偏好或满足相同。(图2)在同组无差曲线中，愈高的曲线表示消费者的总满足量也愈高。

将生产可能曲线与无差曲线合并在一起，就可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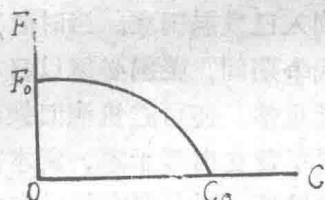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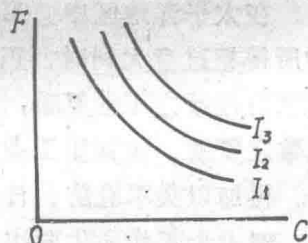


图 2

甲国对食物与汽车的生产量，同时也可决定两者的价格之比率。在(图3)中，生产可能曲线必切一条最高的消费无差曲线于一点。这点就决定甲国将生产 OF_1 量的食物及 OC_1 量的汽车。经过这一点的切线斜率，就是食物与汽车的国内价格之比(OC_1/OF_1)。

如果在世界市场上，有别的国家可以用较优的方法生产粮食；那么在世界市场中食物与汽车价格之比，就会低于甲国国内市场价格之比。所以国际市场价格之比，可用一条比 FC 线更陡斜的价格线 F^*C^* 表示之。这条线自然切生产可能曲线于较低的一点 E^* 。假设国际贸易存在，甲国将改变其生产组合为生产 OC_2 量之汽车与 OF_2 量之粮食。然后将 C_2C_3 量之汽车出口，换回 F_2C_3 量的粮食。因此，甲国人民可以享受到 OC_3 量之汽车与 OF_3 量之粮食。总满足可以接触到一条较高之无差曲线，所以总福利增加了。

就事实看，很显然的，甲国很可能是一个资本密集的国家，所以生产汽车之相对价格较廉。在世界市场中，必有许多劳动密集的国家，可以生产廉价的粮食。甲国在生产汽车上，有所谓“比较利益”，利用这个比较利益与国际贸易，就可增加其总福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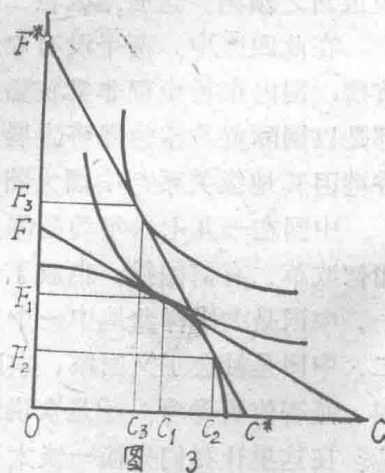


图 3

2、两国间生产要素移动原理

上节所讨论是基于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市场上移动的假设。事实上，资本与劳动经常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国际市场上流动。流动的原则是自要素报酬较低的地方移向较高的地方，以追求最大的报酬，这当然时常会受到各国不同的法律规章之限制。

在完全竞争情况下，劳动及资本的价格都决定于其相对的边际生产力。如前所言，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是受生产力递减律的影响。假设甲乙两国之资本量固定，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可画如（图4）。AA'表示甲国劳动边际生产力，BB'表示乙国劳动边际生产力，两者都是递减，但速度因产业结构而不同。甲国之劳工量是ON₂，所以工资是W₂；乙国之劳工量是O'N₂，所以工资是W₂。甲国之总产量（边际产量之总和）是为OADN₂，而乙国之总产量是O'BEN₂。如果甲国能够向乙国出口N₁N₂量之劳工，则甲国的产量是OACN₁，而乙国的产量是O'BCN₁。两者相加，甲乙两国之总产量较前多出CED三角形所代表之量。C点是一个均衡点，在此点上，两国的工资都是W₁，甲国之劳工不再有向乙国移出之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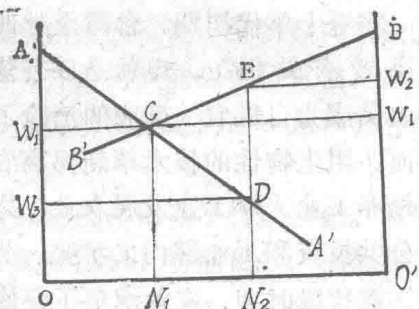


图 4.

3. 对外贸易乘数原理

在宏观经济学中，我们已经学过“乘数原理”。一个简单、原始而关闭的经济体制可用两个联立方程式表示之：

$$C = a + bY \quad 0 < b < 1 \quad (1)$$

$$Y = C + I \quad (2)$$

C是消费，I是投资（恒等于储蓄），Y是国民总产值，b是边际消费倾向。因为投资是外在变数，所以可以解得消费量与国民总产值，而导出乘数如下：

$$\Delta Y = [1 / (1 - b)] \cdot \Delta I$$

如果这个国家有了政府与对外贸易，国民总产值可写为：

$$Y = C + I + G + X - M \quad (3)$$

其中政府支出（G）与出口（X）也是外在变数，进口（M）是唯一的负项。但是国民所得增加时，进口也会增加，所以进口可写为：

$$M = c + dY \quad 0 < d < 1 \quad (4)$$

d就是边际进口倾向，其大小随该国对世界市场之依赖程度而定。将（1）（4）代入（3），可得

$$Y = [1 / (1 - b + d)] (a - c + I + G + X)$$

此时投资或出口增加一微量时，总产量之增加就会比以前少了，这个少掉的部分就是进口漏损（Import leakage）。只要（1 - b + d）小于一，总产值之增加总比原投资或出口之增量为大。但是有许多贸易偏重国家，如荷兰，比利时或英国等，有时进口漏损太大，而使乘数变成小于一，因而削弱了政府财政、工业等政策的效用。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主张采取保护主义减少进口，因为一则可直接增加总产值，再则可提高乘数效用。另一方面，采取奖励出口政策，经过乘数效用，提高总产值。

（三）太平洋地区之经济发展阶段

1. 农业改革

在太平洋地区，除新加坡与香港是城市外，其它地区之经济开发，都是先由农业着手；因为在发展之前农业所占的比率太高了。农业改革方法都是以温和的土地改革，农

技改进，与品种改良为原则。日本的土地改革开始最早，在明治维新以后，政府就以有价公共证券换取大地主之土地，将地主变成固定收入者。而土地改革最成功的则是台湾，南朝鲜、菲律宾等的土地改革政策都是以台湾的经验为蓝本。

在五十年代初期，台湾土地改革之三部曲是“三七五减租”、“公土放领”，与“耕者有其田”。也就是以公营事业之股票向地主交换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大多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彻底的消除了封建式佃农制的陋规，农民收入乃得快速增加。另一方面，用生物性的技术革新提高农业生产力，造成大幅农业过剩。这时政府提出“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之纲领，运用租税政策和低粮价政策吸取农业剩余转用于公共投资和工业部门之扩张。为应付农民拒余，采用肥料换谷，田赋征实等对策。

在这段时期，农业承负了促使经济发展起步的重担。在供给方面，不但供给工业发展之资金，并且供给了工业所需之劳工，农业出口也占总出口之85%，换回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外汇。在需求方面，农村的购买力也造成了工业产品的地区内市场。农业的年增长率是5%，而工业的年增长率是12%。

到六十年代初期，农业开始衰退，稻米公定价太低，谷贱伤农。农村人口开始外流，农耕地转为工业地，农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农业发展方针也着重于新品种之试种与土地集约使用等，而副产品如水果、蔬菜、鱼虾等快速增加。

到一九七二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之39%，农业占总产值的15%，农业输出占总输出中的17%。农业颓势已成，零星措施不能奏效，乃于一九七八年起，大力实行农业机械化，以增加生产力。直到最近，农业年产量虽每年增加，但增加率与人口增加率相埒，可见农业已趋饱和而稳定下来，粮食可以自足自给；但农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已完全被工业取代了。

2、第一次进口替代

在一个小型社会的经济发展之初，许多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人口增加率过高，经常在千分之三十之上，因而引起高度的失业率，另一是因资源贫乏，生产原料及部分民生必需品有赖进口。前者引起社会问题，后者引起外汇短缺。因为进口是国民总产值中之负值，进口增加就使经济成长率下降。

在农业改革后，第一步发展的工业是能替代进口，节省外汇的轻工业与民生必需工业。这些工业的生产规模不大，所需资本少，技术性不高，如食品加工、纺织、成衣、塑料、水泥及制鞋等。其产品之主要目的是供应国内市场，替代进口。

在这段时期内，政府的工业政策对各产业之发展有重要的督导性的影响。政府经常会对无把握有销路的产品工业予以停止或限制生产，以防盲目投资，浪费资源。而对有前途、有市场的工业尽量融资，并扶植与鼓励“民营”以提高生产效率，并鼓励民间投资工业生产。又因为这些轻工业多半是劳动密集性的工业，所以吸收了一部分农业的剩余劳工，解决了农业社会中的“隐藏性失业”之问题。

公营事业的发展对象多为长期性的基础工业如电力设施、交通运输等。为鼓励地区或国内工业发展，政府也采取进口限制，保护关税，外汇管制，或复式汇率，来减少进口。

3、出口扩张性工业

在亚太地区，近年来发展快的都是小型开放型经济体系。在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后，民生日用品供应充分；因为没有进口税之负担，价格下降，需求上升。工厂也多扩充规模，降低成本，增加产量，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但是国内市场狭小，很快就达到了充分供应，人民生活水准提高，经济趋向繁荣。对于剩余之工业产品只有出口，因品质尚不达国际水准，开始时只能以低价求销，成为国际市场上之次货。但是因为劳工低廉，而输出品又多为劳动密集之产品，是以尚有利可图；因此输出的急剧增加反变成了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

经济日趋繁荣，政府之税收增加，到这段时期，公共财政多由赤字转成盈余。政府得以这些盈余从事公共建设，成立加工区，吸收外资，奖励出口，协助出口。国际收支上，就商品劳务而言，已由入超转为出超，而有外汇结余。

在出口扩张时期，失业已不复存在，反而有劳力不足的现象发生，引起工资上升，劳动参与率提高，达到充分就业。对于熟练工人发生缺乏现象，因此对教育问题也加重视，不但求普及也求水准之提高。

4、第二次进口替代

在出口扩张时期的后期，因为国际收支已有节余。就国内言，劳工已呈不足现象；就国际言，产品之竞争力必须提高。而这些小型社会多半没有重工业基础，因此资本财与中间财的进口仍维持很高的水准。

又因为工资不断提升，先发展的地区不能与后发展的地区在劳工密集的产品市场上竞争，因而转向资本密集产品的市场进军，是以更需要品质优良的机器与中间产品，进口数额仍然庞大。可以如何吸引外商来直接投资也是亚洲的新兴工业地区及国家所迫不及待的问题，大家纷纷颁订外资奖励办法，相互间的竞争也就由产品市场扩及到生产要素市场。

由于世界银行对“亚洲四龙”之政治安定性与社会安定性评估甚高，欧美日等国外资纷纷流入，设厂在这些地区生产产品，供应其东南亚之市场。有的是外人独资经营之分厂，也有合资经营。因为这四个地区，除南朝鲜外，劳工成本并不低廉；但是劳工教育程度高，训练成本低，所以发展中变资本密集的产品为宜。由于外国资本以机器厂房的形式流入，当然也有一部分的技术跟进，也提高其本国的技术水准。

此时，南朝鲜与台湾的政府投资也指向重工业，如钢铁、造船、汽车及石油化学工业；一则希望将来能与日本在世界市场一较身手，再则也希望能奠定地区内的资本密集的工业之基础，供应地区内市场的高档消费品，如彩色电视机、冰箱、冷气机、汽车等。而一部分较简单的机器也可自制。于是触发了第二次进口替代工业之兴起。

5、第二次出口扩张

由于地区内市场过份狭小，长期消费品的市场很快就达到饱和点；厂商必须打开国际市场。当此之时，厂商们也发现了许多困难。这些高档产品主要的市场是欧美各先进国；这些国家的人民对购买一件衬衣或一台彩色电视的审慎程度不同；如果没有良好的质量与商品推销网，很难打入国际市场。只有日本之厂商，因得政府与大银行之协助，早就为他们的商品建立了世界性的推销网与商誉；其它的国家之出口商就只好受到层层剥削，以求商品得售。

在一九七三年与一九七八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衰退下来；同时，整个世界工业之结构有一个转变。就前述之高档消费品之品质，就分成两部分来衡量：一是其耐久性与一般的品质；另一则是其“能源节约率”。工业先进国之大公司行号，都有很大的研究部门，可以针对着“能源节约”，立刻发明新的生产方法，推出新的产品，使来自发展地区的进口货无法与之抗衡。

在这一段时期，所谓“亚洲四龙”的经济发展，仍然仰赖着出产为主动力；但是在推动上就困难重重了。总结其原因可归纳如下：

①低档劳动密集消费品如成衣、制鞋等，因工资高，受到了中国、泰国、菲律宾的产品之激烈竞争。

②高档资本密集消费品因“品质”与推销网的不健全，不易与先进国自产货及日本货对抗。

③因为本身无法供给原料或中间产品，非就近向日本进口不可，所以多少受其剥削。

④出口多以美国市场为对象，美国属自由经济，景气循环起伏不定。如以对美国出口为导向，则本身之经济也起伏不定，且波动幅度更大。有位东南亚经济学家曾戏谓：“美国经济打个喷嚏，我们的经济马上伤风，美国经济伤风，我们的经济就得肺炎；只是我们发病在美国的六个月之后罢了。”这虽是一句戏言，却含有高深的学理。

6、工业升级与市场分散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又面临转变。由于电脑工业过去二十年之超速发展，导致了又一次的工业革命。使其它所有工业都必须电脑化，随之发生的另一个现象就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这使太平洋地区及国家对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有了新的认识，就是：“出口业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般经济学家也将工业分成两类：有光辉远景的称为“朝阳工业”或尖端工业，而前途暗淡的称为“夕阳工业”或传统工业。

很明显的，在今后二十年中，太平洋地区各新兴工业地区及国家之经济发展仍将与国际贸易息息相关。发展尖端工业必须有尖端科技来支持，如何发展或引进尖端科技乃成最令人费神的课题。发展尖端科技，不是一、二厂商能独立支持的。应由政府拟定长期的发展方向，并投资来做基础研究；还要设立工业园区（Industrial Park）以促进大学与工商业界科研合作计划。第三就是与先进国订立合资经营契约，以引进尖端科技，分享所赚利润。

此外，对于所有出口商品严加检查，将品质水准要求提高，不合格的商品不得出口，并订立“仿、冒”惩治法规，以维护合法商人之利益，建立良好商誉。

更进一步，要注意分散并扩大商品之国际市场。出口不专指向美国，也注意欧洲各国及发展中地区的市场。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会受某一交易国之经济景气循环的影响而过份颠簸不定了。

二、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与其经济发展

（一）中央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比较

就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可用的生产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如何使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无穷的欲望，就是一个“生产”与“分配”上的优先问题。

就生产与分配的方法之不同，世界上的经济制度可分为两大阵营：

①开放性的市场经济制度：以美国、日本与西欧各国为主。

②管制性的中央计划制度：以苏联、中国与东欧等国为主。

前者是利用市场机能与价格制度，来平衡社会上对生产要素及最终产品之供需，政府不加干涉。所以投资者与消费者在购买资本财与消费品时都有选择的自由，为大众所喜之产品，价格必因求过于供而上涨，存货也因而下降。生产者只要看价格之涨落与存货之多少就能决定：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才能获得最高的利益。每人追求到自己最大的利益，当然社会就得到了最大的利益，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的“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领导着人们，在此制度下，虽然物价不固定，时有波动，一般人民也常会受通货膨胀之扰。但是资本财与消费财之生产与分配都很灵活，对于一国之有限的资源很少浪费，而且轻微的通货膨胀是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

在中央计划制度下，生产要素之分配，最终商品之生产都由中央政府根据主观的判断，然后做出各种长短期经济计划来决定的。一般而言，长期计划如十年计划或五年计划是属指标性的；而短期计划，特别是年度计划，就是执行性的了。在执行性的计划中，先估计一年的资源之可供量，然后明定多少用于投资与消费。在投资中，又明定重、轻、民生工业之比率。在消费项目中，也对各种消费品之产量与品质有所规定。然后逐年按计划施行。到第五年末时，希望能达到五年计划之目标。如果由于资源人力之不足，短期目标有逐渐远离长期计划时，那就证明长期指标订得太高，因此就将长期指标向下调整，所以在中央计划制度下，长期计划并非一成不变，可以因地、因时、因人而制宜。

在中央计划制度下，为求每年之计划能尽量的顺利执行，生产要素与产品不能随意转移，各种价格与工资都由政府决定，生产者与消费者都没有选择，只有照预定的计划去做，如果生产之物品不为人喜，价格不必（也不会）下降，但是存货仍会增多，发生滞销现象。滞销过剧，就用“搭配”等不合理的方法减少滞销货。如果产品大受欢迎，求过于供，发生“短缺”“紧张”等现象，价格仍然不动，但存货剧减，就非用“配给”等方法来强迫迟延对抢手货之消费，是以对投资者与消费者，都有很大的不便，造成生产资源的浪费。

由上可知，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价格与存货好像一把利剪的双刃，两者共同合作，自然使各物之供需达到平衡，减少资源之浪费，尽量使社会上之欲望满足，社会之总福利也容易达到最高点。反观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价格不因供需情形而变，而存货总数统计不易，等到中央计划单位发现存货过高或过低时，再急急调整价格与生产就为时晚矣，必然造成资源之浪费。在此一制度，百姓虽可免通货膨胀之扰，但却会受某种消费品缺少或过剩之苦。生产者也常因原料短缺，不得已而“停工待料”造成生产过低。

如前所言，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必产生一些高瞻远瞩的企业家，他们对于市场供需情况能洞烛机先，投资得法，因而谋得巨利。他们当然会用这些盈利，再来购置资本财，将之投入生产行列。因为他们目光准确，自必又造成巨利。周而复始，自然造成财富之急剧累积。此时如果完全采取自由放任经济制度，自会形成贫富两极化，造成社会不安。在一般西方国家，政府可用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赋税政策来节制资本之过份集中。政府也可用这笔收入来从事许多社会福利工作，以缩短社会上贫富差距。再者，因

为工会之成立，许多大型公司之经理人员也愿与工人同享盈亏，以激励工作效率，减少经营之困难。因而用“分红制”，“奖金制”等方法以提高工人收入，使每个工人都成为公司股东，公司上下群策群力，以求利润最大，劳资均沾。先求经济快速增长，再求分配公平。这就是先求富再求均的作法。

在中央计划制度国家中，一般多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经济之指导原则，一切资本财之价值是其生产过程中劳动剩余之累积，因此私人不许拥有资本财或生产资源。所有企业都是公营公有，工人薪津之节余只可存入银行，不得自动投资生利。

又因为经济计划之重点，多着重于重工业，而忽视了有关民生之轻工业，消费品之供给少，仅必需品而已，且商品价格固定，人民收入即使多了，也无法拉高消费水平，改善生活，因此影响到工作意愿。再者工资固定，因此惰工、怠工情形时常发生，而工人之工作都有保障不得解雇，所以生产力低，产生了许多吃大锅饭的冗员。久而久之，在“均”字上做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是生产缓慢，经济不易发展，国家很难“富”起来。

（二）价格制度与市场机能

价格制度与市场机能以及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动机就可以使人类在经济上发生“分工”“交换”等互利的行为，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的“一双看不见的手”。既然在市场上的交换可以使买卖双方都得利益，即就不能认为市场是一个剥削的地方。在市场上买者与卖者自愿交易中形成的价格能够把所有寻求自利者的经济活动协调起来产生更精密的分工，使人人获益。价格制度在经济系统中的功能也可分三方面讨论。

1、传达信息：当某一种产品的需求在市场上增加时，零售商自会向批发商多购入该产品，当制造商收到了批发商的新订单时自然向原料商增购原料并且多雇工人。为了能有更多的工人来就业，就必须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这样，全世界各地都知道了某产品需求上涨的信息。如果生产工人工资上涨，或原料价格上涨因而产品成本上涨，又经过上述之通道，一直到消费者，都会知道某产品的价格高了。于是消费者根据这个信息可以重新调整他的消费习惯。

2、激励生产：因为市场上的每一分子都是自利的，当价格有变动，自然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以适应，生产者自会变动其生产函数中的组合以使他的利润最大。也可使原来从事别项生产者转行竞争。价格对于消费者也有激励作用，当价格上涨时，他们也可以削减需求或是利用其它替代品。

3、收入分配：在一个社会上，如果某一个人的收入都相同，那就是一种平头平等，会使人失去工作意愿与创业的兴趣，如果让价格制度在市场上充分发挥作用，就不会有这种现象。生产大众所喜的物品，经过价格机能，一定可以谋得高利，反之生产人人唾弃的物品，经过价格机能一定会要赔本。所以一个人的收入高低可以透过价格功能显示出他对社会的贡献，所以收入分配就不平均了。

（三）兰格——伦纳模式

兰格与伦纳两位经济学家曾合写一本关于如何将市场机能与价格制度导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书。他们的方法关键在如何让国营企业在市场中开展竞争，其中心思想是将市场作用的结果转化成为对国营企业经理人员的指示，以办好企业。例如，在自由竞争的市

场中，价格趋向于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相等。兰格与伦纳主张让国家指令国营企业的经理将其产品的价格定在相当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上，或者使规定的产量恰好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在计算边际成本时经理可用最接近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来计算工资、利率和原料成本等。

按照他们的构想，个人收入并不完全由自由市场决定。经理们在进行投资业务时，不是用他们自己的钱来投资，而是使用国家的资金。投资的风险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风险而是国家的风险，而工人的实际收入也不等于企业经理在计划产量时所概算的工资。

虽然他们的构想是使计划经济之计划人对自由市场的情况进行估算，因而真正考虑那些与提高生产效率有关的因素。但是还是有许多无法避免的缺点，最大缺点之一就是缺少企业家与企业家的冒险犯难的创业精神，企业既属国营，经理人员能受到什么激励？又无健全的价格制度，经理又何来信息作正确的判断？因此多半经理人员都会墨守陈规，但求相安无事算了。

（四）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的经验

南斯拉夫是种族、宗教、语言、文字最复杂的欧洲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的三十余年已从“落后国家”走上经济起飞阶段，成败之处都值得参考。南斯拉夫经济发展中所实行的经济体制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7~1951）是中央集权制，第二阶段（1952~1964）是分权制度，第三阶段（1965~1980）可称为改良制度。

第二次大战之后，南斯拉夫模仿苏联，采用中央计划经济，设立许多中央、地区及省县的管制机构，组织复杂重叠。结果生产与需求不能配合，滞货短缺时时发生。中央计划制既行不通，然已形成废除不易，乃于1959年通过准许工人参与生产单位的管理工作，到1963年成为宪法的一部份。1965年之后更扩大实行。现就几个重要论题来看南斯拉夫的经济之经验。

1、企业组织及管理：工人参与工厂管理，在原则上是促使生产单位自给化，不受政府与党的干涉，而达到为劳工大众谋福利，以提高劳工效率。凡是在五人以上的生产单位，全部社会化。五人以下之单位仍可属私人。工人参与管理以选举代表方法，代表再选业务经理，代表任期一年，经理四年。他们主要的任务在决定待遇、收益分配、投资、工作纪律、安全、卫生、雇佣及开除等事项。对工人代表的职责、权利及管理，各单位有详细规定。但是总经理与业务经理的职位往往连任，变成职业化。他们的影响力常超过所赋予的权限，趋向官僚化。这是企业自治化初期的重要缺点。

2、市场经济：1964年该国工会决议，由市场经济的自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生产单位的营业方针。但是计划经济的影响力透过法律，税率，外汇管制等仍然阻碍自由发展。结果发生失业，房屋缺少等。在实行市场经济后，政府税率降低，对物价的管制也逐步放松。物价上涨刺激了生产，投资也增加，后来因物价上涨造成高度通货膨胀，政府才用货币政策来平抑物价。

3、工业化及投资：因为采用市场经济与企业自治，政府的工业化政策虽然不变，但控制力渐小，因着重经济扩张，投资额非常之高，造成通货膨胀。在此时期，资金已分存各企业单位，但地方政府时常挪用。企业单位也热衷于新投资，因为营业损失可由政府津贴，免税或其它方法来弥补，也就成了效率高有盈余的单位要津贴、效率低、有亏空

的单位。这种情况到七十年代才渐渐改善。企业单位真正有了自治权，盈亏自负。资金的保留额，分配投资完全单位自行决定。营业也符合市场供求原理，于是消费品供应大量增加，工商业繁荣，税基扩大，税率也普遍下降。

4、工资制度：南斯拉夫劳工的工资制度也变更了数次。初期在中央计划经济下，工资由政府决定，一般待遇极低，几乎不能温饱。以后因市场经济开始，工资决定方式是由中央政府作年度预算时，即决定每一企业的总收益中按规定比率拨款作储蓄及福利金额。员工工资即在此项开支。拨款比率各行业不同，由政府决定。此法实行了两年（1952~53）就因分配不公而废止。从1954~1957年期间改为分配盈利制。工资分两部分：基本工资与红利。基本工资按生活需要定。红利则由生产单位盈利项下划拨，但因各企业盈利情形不同，会计方法不同发生纠纷，乃放弃此一制度。最后是收益分配制，企业经营成绩与员工的报酬有直接关系。计标方法分两次，第一次决定企业单位总收益，扣除固定成本如原料、水、电、折旧等，剩下的部分为毛利，从毛利中再扣除保留额作再投资用，余额即为员工的总收益减去所得税及社会保险等，即为纯收益。第二次计算是将纯收益分配给每个工人，计算方法颇为复杂，根据职位、教育、经验等而定。主管人员多有额外福利如汽车住宅，出国旅行等，此种制度纷争亦多罢工时起，且生产单位因市场不同，收益不同，造成同类工作而报酬不同。再者保留额到底应保留多少，企业既然自治，大家都抱着“多得不如现得”的心理而提高待遇累积率低，生产增加慢，也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

5、国际贸易：在第一阶段着重自给自足，对外贸易由中央政府执行，采取物物交换制。在第二阶段，企业自治开始后，政府颁发对外贸易执照给一些特准的企业。国家银行设立一项基金作为进出口支付之用。在参加IMF以后，为符合该会章程，对进出口的控制放宽了许多。企业单位可以直接对外贸易。但50%的外汇收益必须上缴。因采复制汇率，出现黑市等不法交易。1955年乃设立外贸银行管理外汇与外贸。1961年起实行统一汇率，结果进口大增，外债大到无法支付。1965年IMF再次援助贷款，但要求南国将货币贬值以利出口，但是进口并未减少，出口却大幅增加，国内通货膨胀更烈。1965年以后外贸政策侧重国际分工，进口西欧的工业设备及原料，出口纺织、鞋类，工具、金属品等，再者因有侨汇弥补，外贸仍有逆差，但不似前严重。

总而言之，南斯拉夫的经济体系是混合性的体制，而不是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从资本主义借用了市场机能的概念，从社会主义借用了生产资源社会化的概念，从无政府主义借用了生产者自由组合的概念，成了一个三不是的体制，在生产、分配、需求、供给上都发生了许多不能配合的困难，但较之于一成不变的中央计划国家，南斯拉夫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仍是足以称道的。

（五）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经验

1、经济改革之目的：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之后，该国之经济发展就一蹶不振，各企业之生产量总是不能达到政府经济计划所定之高指标。一九六八年匈牙利施行“新经济结构”（New Economic Mechanism）政策，从事大幅经济改革，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减少中央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以求提高行政效率与经济效益，但是并不削弱政府在经济计划与政策决定上所据有的重要地位。他们希望在不放弃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条

件下，加速经济成长，以提高国民所得，改进人民之生活水准。所以这次改革之目的，也可以说是希望能吸取市场机能与自由经济的优点而并入其原有的体制中，施行一种较温和与灵活的中央计划制度。

2、经济改革之内容：经济改革之第一步是建立起较能反应市场上供给与需要之实际情形的价格制度。政府对各企业在产品的“质量”“价格”与“种类”上订有广泛的指标外，最重要的指导性指标就是利润多少。各企业可按其本身的特性与条件来作生产与分配的决定，以求达到利润标准。此外，政府并允许成立一个修正性的市场（类似自由市场）。各生产企业可依据消费者在这个市场中所表示的喜恶来决定因应之对策。

在实行改革之伊始，各大企业都施行逐层权力下放；授权其所属各单位自行决定其生产与销售的结构。在国营企业中，不再坚持“同工同酬”的原则；凡经营良好而盈利高的公司，其工人之工资也按比率提高，这就激发了工人努力工作的向上心，其作用虽小于个别奖金制与红利制，但总生产量在几年内也显著地增高。

经济改革的另一部分是修订并简化补贴制度与租税制度。在改革之前，政府对某些必需性的消费有大宗补贴，以压低其价格。同时，对其它高档消费商品，又大宗征税，以提高其价格。所以常造成消费与短缺同时存在。改革之后，政府对消费者之补贴大量削减，虽然短期内曾导致物价巨幅上涨，但是到价格能反应生产成本后，也就稳定下来。此外政府对经营业绩不佳之企业的长期补贴也予取消，任其自行合并或解散。在租税简化上，取消了财产税，降低了工资税，但是却增加了最终成品的销售税，以补足政府收入之不足。

3、对外贸易：经济改革之后，各企业单位可直接与外商接洽，定约及进行贸易。如美国可口可乐饮料，李文牛仔裤与马李罗香烟等公司都先后与匈牙利企业订约合作生产产品不但供销国内市场也准许其独占东欧各国之市场，透过这些合作计划，匈牙利也引进了许多西方之生产方法与技术。

至于进口原料与能源之价格，则任其与国际市场价格拉平，并随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政府不予干涉，以求“以价制量”而今各使用进口原料及商品之单位能自动节约，尽量少用外汇。

4、改革之成效：匈牙利在改制之初曾遭遇到相当的阻挠，一是共产党内之保守派，另一是一小部分因改革而须放弃其一部分利益者。在七十年代中期，匈牙利之经济改革已见相当绩效。“新经济结构”政策不但提高了人民之生活水准，同时也改进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

匈牙利之经济改革的方向与幅度都不同于南斯拉夫之改革。改革之后的匈牙利仍是计划经济为主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仍为国有，较小的企业则为集体所有，在大城市中也同时存在许多私营的极小型的企业，只是比例非常之小，由于企业仍是国有，职工工作的积极性，还是不如私营小企业高。以农业为例，百分之八十的农业是由集体化的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所控制，但就农业产量看，农业个体户仅使用全国十分之一的耕地，就生产出全国三分之一的农产品。

就西方经济学家看，匈牙利的经济改革的前途是乐观的，因为党主席卡达尔与大多数群众都是支持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同时在经互会中，卡达尔很能取得苏联之信

任，所以可放手去做，而不受外来干扰。反观苏联与其它东欧国家之改革只是片断性的（Piecemeal manner）收效当然不大。总的来说，匈牙利已经在维持其原来政治制度下，发展了一个市场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附表

南、匈与亚洲四龙的比较

国 名	人均国民总产值（ GNP）				平均经济 增 长 率 %（ 1973 ~1982）	人 口	
	金 额（美元）		世 界 名 次			人数(千)	名 次
	1983	1982	1983	1982			
美 国	14,090	13,160	4	7	2.5	233,739	3
日 本	10,100	10,050	14	16	4.3	119,259	6
新 加 坡	6,620	5,980	22	25	7.9	2,501	93
意 大 利	6,350	6,790	23	22	2.4	56,329	12
香 港 地 区	6,000	6,150	25	24	9.5	5,313	71
台 湾 地 区	2,744	2,597	32	36	8.0	18,603	34
南 斯 拉 夫	2,570	3,100	33	33	5.2	22,777	28
匈 牙 利	2,150	2,260	39	39	6.0	10,699	45
南 朝 鲜	2,010	1,910	42	44	7.2	39,958	19
中 国	290	300	89	91	5.7	1021,630	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5年版ATLAS

管 理

〔英〕格伦·波特

管理之成为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主要是与现今这个世纪相联系的。西德尼·波勒德曾经指出，“实际上直到二十世纪”对管理的广泛研究和公开讨论才开始出现〔1〕。有关管理的一套想法，象大多数所谓实用的知识一样，只是逐步适应人们广泛感到的需要而出现的。直到人类历史的晚些时期，高度有组织的活动的数量和多样性——大多在工商业方面——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产生了如何有效地支配这种活动的系统化思想。

在各种不同的说法中，如果我们以亨利·法约尔的经典定义作为一种实用的定义，那么管理者所做的事情就是从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人们的活动，以达到某种特定的目标〔2〕。除工商业外还有许多活动显然也需要管理才能，例如在古代，国家和教会的复杂事务，无疑也需要管理的才干。因此，处理一般管理问题，特别是公共行政的一套重要思想和做法就出现了〔3〕。然而，在“管理”这一章，将首先谈到工商管理，因为经理的形象已经开始与工商业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管理者被正式看作为工业化的产物，又是工业化的执行者。由于现今西方城市化、工业化特有的组织形式是庞大而复杂的官僚机构，因此管理显然是二十世纪特有的现象。然而，它有许多重要的根源，应该追溯到较为遥远的过去，特别是十九世纪后半叶。

首先产生管理问题需要解决的是工厂和铁路两种企业机构。在十九世纪，大量的厂商第一次面临了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如何管理高度细致的、复杂的和相互联系的经济活动的共同问题。长期以来，特别是个体所有制的管理者钻研了这方面的问题，通常采取就事论事、边做边学的方式。因为他们认为在轧花厂、铁路和翻砂厂这类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企业之间，很少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当一个企业遇到现在被认为是管理方面的问题时，它通常不能形成一套理性的、系统的思想，写成书籍或大学课程这类的材料。大多数早期的管理者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或同伙人有限的实践经验。然而，由于越来越多的工业单位急剧增加，由于他们的领导者遇到新的和日益复杂的问题，因此一些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共性，而且开始著书立说了。

从一开始，管理的研究这一课题就常常被局限于企业如何去实行它开始所做的一些决定，而不去考虑这家厂商应该从事哪些产品或任务的根本选择。后面的决策，即规定企业目的和特性的基本决定，总起来说，可以被认为是战略的或长远的决策，或企业家的决定。另一方面，策略的或短期的选择只是完成这个组织的基本战略的最优方法。以往管理的研究常指策略的分析，而不是战略计划和决策的分析，虽然在最近几十年中这种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改变。